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五期 ——
(二〇一〇年四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004a)

【文革公案】	“文革”期间中央警卫局是怎样进驻钓鱼台的	邬吉成·王 凡
【人物春秋】	陈里宁事件始末	李 佳
【史海钩沉】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何云峰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	舒 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文革公案】

“文革”期间中央警卫局是怎样进驻钓鱼台的

• 邬吉成·王 凡 •

1968年的“三八节”前几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受杨成武委托，查找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

此事起因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鲁迅的手稿丢失。毛主席让周总理查，周总理又交代给了陈伯达、杨成武。杨成武在周总理的提醒下。想到了北京卫戍区。

傅崇碧立即根据一点线索，辗转追踪，最后查出手稿在中央文革小组，是经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员卜信荣之手，存入保密室了。他马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江青，可江青不在，接电话的是办事组的人。

在询问了卜信荣的情形后，傅崇碧要接电话的人将查手稿事告诉江青，自己马上赶到钓鱼台，他随即叫上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同行。黄昏6时15分，傅崇碧的两辆车到达钓鱼台东门。

在东门，傅崇碧告诉哨兵，已经和有关人员打招呼到16号楼来。他们随即给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事处打电话联系，是一位姓孟的人接的，当时没有给放人的明确答复，而是把电话转到了陈伯达的办公室。

陈伯达当时不在。他的秘书王保春听了这一情况后，同意傅崇碧等进钓鱼台。据当事人回忆，傅崇碧他们进入钓鱼台后，碰上了正在散步的姚文元，是姚领他们进了16号楼的会议室等候。

刚坐稳，江青就进门了。她高声吼道：“傅崇碧，谁叫你进来的？”傅崇碧被她喊得一怔：“在东门传达室联系过啊。”秘书冯正午也说：“在传达室打了电话。”

“给谁打的电话，跟谁联系的？”江青连连逼问。“陈伯达……办公室……”冯正午没见过这阵势，有点慌。“陈伯达在哪儿，办公室哪一个？”不等回答，江青就发出一连串质问：“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我们报告过了，我们哪抓人啦？”由于始料不及，傅崇碧也有点招架不住。“傅崇碧，你就是没请示！”姚文元也加入进来。“你解放军带头这么干。在北京，在‘中央文革’所在地，你就这么大胆，这还了得？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江青开始上纲了。

由于没有休息好，被江青、姚文元突如其来这么一刺激，冯正午紧张得一阵晕眩，栽倒在地，手中的公文包飞了出去。江青被惊吓着了，高叫：“他拿皮包打我！”

傅崇碧发现冯正午已经昏迷，这种情况以往也发生过，连忙叫人把冯正午抬到椅子上。可江青还不依不饶：“快检查一下，看他皮包里有没有枪和子弹。”

一阵忙乱后，傅崇碧已经趋于冷静：“江青同志，我是来汇报鲁迅手稿的事情的，这是你交办的。现在已经查清，手稿和保管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小组。”“不可能！”江青依然不信。

傅崇碧拿出了“中央文革”保密室工作人员卜信荣的收条。江青叫来卜信荣，又下令搬来了四只箱子，核对确是鲁迅手稿无误，对此没什么话好说了。但她把气撒到了卜信荣身上，说他是坏蛋，叫人把他抓了起来。

卜信荣被带走后，江青又虎起脸，朝傅崇碧说：“你的事没有完，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第二天晚上，江青在16号楼开会时说：“傅崇碧带人带枪闯进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还说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她的腰部。姚文元则随声附和作伪证。

江青给傅崇碧安了个“武装冲击钓鱼台”的罪名，这件事自然和负责保卫的我们警卫二处有关系。事情发生的当晚7时30分，汪东兴就和我通了电话：“一，我担心驻地警卫出问题，因新兵多，要注意；二，我担心内部人员出问题；三，我担心首长外出出问题。你们要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3月10日，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又召集警卫会议，参加的单位有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公安警卫一、二师，中央警卫团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会上又讲了傅崇碧进钓鱼

台的问题。

接着，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国防部大楼的安全警卫，作了新的规定。杨成武一共讲了七条：一、任何一个人进这五个地方，都要事先打电话报告，经批准得到同意后方可放行，而且必须是首长批准，秘书或警卫批准不算数；二、被批准进去的人只能是本人，其随员不得进到院里楼内；三、被批准进去者到指定的会客地点等候，不得乱窜；四、送文件的通讯人员，不得直接送到首长住房（办公室），信件要经中办秘书局转递；五、不管任何人的汽车，进入这五个地方时。哨兵不仅要认车而且要认人；六、任何人进入首长住处时，不准携带武器和危险物品；七、今后中央开会时，不准送文件到会场。

三天后，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又打电话给我，除了再次重申杨总长的七条外，还嘱咐说：“今后凡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开会的首长，如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等，他们的随员可以进去送送药，做些临时性的事情。”

过了些时候，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人民大会堂向有关人员交代：要保证中央12位首长进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时的畅通。现恢复原规定，能够看清车里的人就行了，出入时车内不需要开灯，也不停车检查。

汪东兴还召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部分干部，就警卫工作打招呼。其要点是要改变一下警卫形式，首长乘车也将改变。他说之所以要改变，是毛主席亲自作了指示：常委外出带前后卫车，可以不打电话，但要带上武装警卫。毛主席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提高警惕。”

谈到钓鱼台的警卫时，汪东兴说：“二处的任务很重，邬吉成、毕景荣、李连水昨天已做了分工。首长外出随卫任务由警卫团搞，沿途的路线也要搞；生活服务由张振良负责。在16号楼开会时，二处要照顾好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这几个人。”那时除了政治局常委外，江青外出时，也有前后卫车护卫了。

“武装冲击钓鱼台”的余波，直到“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倒了霉，仍涟漪不断。保卫对象的保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来。4月4日下午，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还是要交代江青的警卫问题，要我们二处全体人员在驻地等他，还核对了名单。

2时半，汪东兴到了钓鱼台，简单询问近期警卫情况后，他说江青要和大家见面。可汪东兴去了江青那里半小时，返回时说江青有事来不了了。就由他本人对我们二处作了几点指示：一，要派一个科长加一个新同志和周金铭共同担负江青的随卫任务；二，邬吉成要多考虑全盘工作，不要老跟车搞随卫了。

回溯在钓鱼台的日子，我个人觉得故事多、感慨多的就属江青了。江青本来住在中南海里，她的警卫工作一直由负责毛主席警卫的汪东兴管。江青的花样多，喜怒无常，汪东兴对她的事很挠头。

我和警卫二处去钓鱼台负责警卫时，江青已经搬进那里多时，汪东兴就把江青的警卫工作交给我兼管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免不了要和江青打交道了，当然最初还不是面对面的。

我们刚进钓鱼台时，江青住5号楼，当时她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还不够专门警卫资格，连专职秘书也没有，只有一位原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孙立志跟着她，既当随卫，又兼管文件的收发。新安排到江青身边的原来专车运输处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兼着负责她的生活事宜。

我印象大约是在1967年初，江青搬去了11号楼，因此人们一度以“十一楼”代指江青。江青搬到11号楼后曾患过一次重感冒，毛主席曾亲自到11号楼看望江青。在我记忆中，那好像是毛主席最后一次进钓鱼台。

在这里住了约两年。大概是因为11号楼离12号楼太近，又是12号楼的附属楼，江青感到不方便，就又搬到了10号楼，还把17号楼的小礼堂作为她开会、会客和看电影的专用活动场所。后来甚至连打桥牌、请理发师做头发都在17号楼。

17号楼，等于是个多功能楼，有个礼堂，可供召开较大的会议，还可以举办娱乐活动、放电影、跳舞什么的。只有几个服务员住在里面，没有供首长和外宾住的高级套间。江青请新华社摄影部的负责人和一些著名的摄影师，为她在17号楼布置了一个很不错的摄影室。登在《解放军画报》封面的那张著名的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大照片，就是江青在17号楼的摄影室内照的。

众所周知，江青爱好摄影。除了在17号楼摄影室，她还常在院内找些景物，或以警卫战士为主题拍摄照片。有一天晚上，皓月如盘，江青来了灵感。她在17号楼前的松柏周围，架设了几支荧光灯；又从二处挑了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卫参谋，要他斜挎冲锋枪，站在松柏下做模特，按照她的要求摆出各种造型，然后噼噼啪啪地按动快门。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江青整整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才收场。当模特的警卫面对强烈的荧光灯，眼睛被晃得十分难受，但也不得不忍耐着。江青的这幅杰作被刊登在1970年《解放军画报》8月号的封底上，标题为“提高警惕”，有些文章中称之为“月夜哨兵”是舛误。

照片发表时的作者署名为“大海”，但据知情者回忆，江青自己原来选用的署名为“高山”。当时《解放军画报》的负责人见此，托送照片的人传话给江青，最好不要用“高山”署名，因为画报社有个名叫高山的人，还犯过错误。江青采纳了画报社负责人的建议，改用了“大海”。但她还是很喜欢“山”，“江上有奇峰”嘛，所以她就又想了一个笔名“峻岭”。

曾经有一段时间，江青心血来潮，提出要学开汽车。那好像是在1970年到1971年间的事，江青处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吩咐警卫处汽车修理厂改装了一部红旗轿车，增加了一个制动器，作为教练用车，教员就由给江青开车的司机李子元担任。

江青向来任性，学车根本不听教员的指导，车被她开得像脱缰的马，有时撞到马路牙子上，还有一次直直地冲进了警卫人员种的蔬菜地里。后来，她觉得汽车比较难于驾驭，兴致也不似开始时那么高了，便再也不碰了，小李这才松了口气，感到解脱。

江青在讲到自己的时候，总爱自诩不脱离实践、不脱离劳动。她举的最新的例证，就是在钓鱼台内和身边工作人员种蔬菜，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甚至还搞了块试验田种植中草药。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曾对中南海的警卫、管理人员提出过不要种花，花虽好看没有实用价值。还是种蔬菜好，种菜可以改善伙食。从那以后，中央首长的住宿区域，都种上了一些蔬菜瓜果杂粮。

钓鱼台国宾馆也不例外，偌大的庭院里也种了一些蔬菜。我们警卫二处一进钓鱼台，就在办公和驻地的楼房前的空地上开辟了蔬菜地，并逐步扩大，种了各种品种的蔬菜。

关于种蔬菜、搞试验田及种有经济价值的树木等事，确实都在钓鱼台国宾馆内发生过，也

确实和江青有关系，但要说到她参与劳动和实践，就要大打折扣了。

先说种蔬菜，她只是散步的时候偶尔绕过来看看，没有在此流下一滴汗水。

搞中草药试验田的主意，的确是江青想出来的。对此她一窍不通。当然绝大多数人对此也一窍不通，所以她拉上了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跑到了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中国中草药研究所参观了一通。她从研究所要了十余种中草药的种子，带回钓鱼台国宾馆。然后吩咐在17号楼小礼堂工作的人员，在楼前开了一小片地，播上了种子，名曰中草药试验田。

此外，在钓鱼台国宾馆院子的另一处，也是在江青的提议下，由钓鱼台国宾馆的工作人员种了一片水稻实验田。对这两块试验田，她除了指手画脚之外，从未躬身参与过劳作。这些事大致都发生在1970年前后。

1973年，不知是何缘故，引致江青突发奇想，要在北京这种冬寒地带，进行茶树种植试验。她说：“过去都说茶树不能过长江，我要叫它过黄河。”

江青生出这个念头后，由王洪文跟浙江省打了招呼。保卫钓鱼台的警卫二处，专门派了一位科长到杭州，在当地有关部门指点下，挑了四棵最好的茶树，是很大的成树，用空军的运输机空运到北京，也栽在了17号楼前。

为了护养这四棵茶树，还专门从生产纯正西湖龙井茶的杭州梅家坞，召了两名熟悉茶树种植的青年茶农，入伍穿上了军装调到北京进了钓鱼台。春天种下后，经过一个夏天的精心护理，成树是活过来了。但到了冬季，虽然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各种保暖措施，茶树还是受了严重冻伤。第二年开春，其中一棵已经处于半死状态，剩下的三棵情况也不妙。因为是很珍贵的茶树，江青眼看着没有办法挽救，赶快让起出运回了杭州。

勇于革新和注重试验，这在今天无疑也是值得嘉许的精神，但在这之后，还要有全身心的投入和对科学的讲求。江青的革新和实验，多数带有心血来潮色彩；而且她的革新和实验，没有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福祉，倒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浪费。

□ 《中外书摘》 2009年第12期

~~~~~

## 【人物春秋】

### 陈里宁事件始末

• 李 佳 •

王广宇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沉默的疯子。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

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 ◇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建国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他那时已经是共青团员，去市委工作对他们一家来说，是个无上的光荣。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带着善对新生的感恩，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中共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入党。一切似乎都在光明和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民党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对于新社会的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国民党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其实当时党组织对他未必有什么看法，但敏感的陈里宁却忍不住疑神疑鬼，老觉得组织在监视自己。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 ◇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出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他到处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还不断地给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当时，分管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见信后，批复这件事要深究。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和护士王志都属于红卫医院的造反派，他们同情陈里宁因反刘少奇被关进监狱，鼓励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像。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夺权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手里，王力随即批示要派人展开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解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的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解救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明这个人早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者”，先知先觉。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 ◇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主席，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很重视，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陈里宁显然很重视组织的重新重用。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写了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和信件。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戚本禹的爱护，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 ◇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当时社会上针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很对立，一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左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他是反革命，篡改毛主席著作。唯独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精神病。

局势已经超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控制。戚本禹不得不考虑找个疗养院把陈里宁控制起来。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一家疗养院，不想陈里宁却死活不去，而且要求马上回湖南。而当时湖南正处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陈里宁若是回去，必定又成为被两派斗争利用的棋子。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戚本禹试图散发传单，号召不要因陈里宁影响大联合的方式来平息两派愈演愈烈的争斗。10月21日，负责公安系统的副总理谢富治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开会，会上对陈里宁的事件作了权威定性：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广宇获得平反并进了《红旗》杂志社，杂志社后来改名《求是》杂志。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此后，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呼吁，对陈里宁作出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宁回到长沙，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简陋的居所里，读书看报，每天散步，还考虑个人问题，开始征婚。他还记得以前有人向他求婚，于是给那些人回信。

陈里宁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宁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 《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22期

~~~~~  
【史海钩沉】

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

• 何云峰 •

毛泽东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语言隐晦，内容深奥，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历来是史家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思想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自从它公布以来，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就2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信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对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之后，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研究逐渐起步。20世纪90年代，研究开始出现深入的趋势。但总的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突出表现在研究毛泽东致江青信的专题论文太少，只有几篇，主要包括金春明的《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胡为雄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许全兴的《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辛鸣的《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刘林元的《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等。其它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一些研究论著或者相关论文中，其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李君如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陈东林的《毛泽东诗史》、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逢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论著都对毛泽东的这封信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毛泽东信中的某些论断、提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多了，在此不一一赘述。

尽管研究成果不是很集中，但学者们对毛泽东这封信的重视却是共同的。王年一在他的大作《大动乱的年代》中，极为看重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他声称：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破”的意见；如果说《五七指示》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1〕。胡哲峰、孙彦编著的《毛泽东谈毛泽东》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左、中、右各派，又预言他去世后中国的未来，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同寻常的信。这封信连同《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是研究毛泽东晚年心境和性格的三个重要材料〔2〕。许全兴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文辞优美，生动幽默，诙谐含蓄，富有哲理，耐人品味，是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思想与实践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之一〔3〕。

同时，学者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研究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正如金春明教授所说：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内容深奥离奇，表述曲折晦涩，评价众说纷纭的，恐怕没有超过“文化大革命”之初他给江青的那封信的了〔4〕。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知难而上，在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地开拓着，取得了若干重要研究成果。

二．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和有关情况

关于信的写作背景，学者们的叙述大同小异。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此信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沉思后的结果。在毛泽东身边长期负责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张耀祠还提到，信中的一句话，如“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等，毛泽东在滴水洞时都说过。对于林彪吹捧他的一些话，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自在，说：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5〕这些材料，都印证了学者们的上述看法。但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6〕。张耀祠的回忆录否定了这一说法。张耀祠说：“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5〕在这一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构思于滴水洞，写于武汉。

关于这封信写出以后的一些情况，各方就说法不一了。党史专家谭宗级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中披露：林彪得知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内容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写到毛泽东这封信的时候曾在注释中引用了谭宗级的这段记述。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的这段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8〕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9〕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4〕。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4〕

综合各方说法，有几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当时看到过毛泽东这封信的人有徐业夫、王任重、周恩来和江青，林彪即使没看到信，至少也知道信的内容；第二，信的原件已经销毁，抄件还在，保存在中央档案中，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第三，这封信正式公布是在林彪垮台以后。1972年批林整风时，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信的内容才广为人知。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全文收录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并在文末注明“根据修改件刊印”。近年来，有学者据此对毛泽东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有可能是事后之伪作，即使信真的存在，这封信在林彪垮台后公布时也被作了大量修改，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种质疑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根据上面众多的权威记述，所谓“修改件”，当是指“徐业夫誊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毛泽东仅仅是改了一些抄错的字而已，并非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所作的内容上的大变动。应当肯定地说，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

三．关于信的动机和主旨

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动机和主旨，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争论最多的热点话题。江青及其党羽在批林整风时宣称毛泽东写这封信旨在揭露林彪的反动本质，认为毛泽东在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刚出笼时就已看出其“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4〕。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金春明教授指出，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过分赞誉之词有些“不安”，对林彪讲话的某些内容也不完全赞成，但从总体上看，对林彪是信赖和依靠的，他把林彪视为帮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的目的，绝不可能是为了揭露林彪。刘林元教授指出，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在否定了“揭露林彪说”之后，学者们对信的主旨展开了争鸣。在讨论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自我解剖说”，提出者是金春明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信的侧重点似在于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毛泽东通过“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自喻，中心似为了说明，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英雄，有时也不那么自信，常感到“盛名难副”，但既然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已经使自己坐在“大王”的位置上，自己反复解剖自己，认为还是有虎气的，而且“是为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条件是具备的。因此，对于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自认还是能够胜任的〔4〕。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备忘录说”。提出者是许全兴教授。他认为，这封信的中心点是林彪，整个信是围绕着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感到不安而铺陈下去的，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也是为了说明林彪的那些提法不妥。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表明他对林彪不完全放心；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了“备忘录”的作用（3）。

第三种观点可称为“阶级斗争说”。辛鸣在《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这封信的着眼点是而且只能是四个字：“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或许正是这封信最好的注解。毛泽东居安思危，从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嗅出了火药味，这便是“牛鬼蛇神”和“右派”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反对与破坏。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牛鬼蛇神”和“右派”正是新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宏图大略。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可以说是一颗蕴涵着超高能量的思想原子弹。它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主旨，并成为进行“一次全国性演习”的导火索（10）。

第四种观点可称为“不安心态说”。刘林元教授在《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一文中认为，自我解剖和评论林彪讲话都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并由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申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总之，这封信表露了毛泽东在“决战”前的不安心绪。这方面虽然着墨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6）。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选择给江青写信这种特殊方式来阐述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者也各有推测。胡为雄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向江青论述自己发明的社会一乱一治的政治哲学，遥控着江青这个被自己扶起来的‘文革’旗手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去全面点燃‘文革’烈火，完成‘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任务”（11）。许全兴则反驳说，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此信应当秘而不宣，不能示人，不但不能公之于世，也不能给周恩来、王任重看，显然，这与事实相悖。许全兴认为，毛泽东此举有着复杂的隐衷：他一方面决心让林彪取代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存有疑虑，有点不放心，心情有些矛盾。这种微妙心理，毛泽东在当时无法向人明言，但又感到需要让后人知道，所以他在正式公开选定林彪做接班人之前，通过给江青写信的方式，曲折、隐晦、含蓄地表达他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也是复杂的：一是为了万一以后林彪真的成了修正主义者，出了事，可以取得后人的某种谅解（毛泽东1972年公开此信就含有此目的，表明他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的）；二是为了让江青了解他在林彪问题上的全面看法，希望江青对林彪要留心一点（3）。

刘林元也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此信确有告诫江青之意，但他与许全兴的理解又有不同。刘认为，毛泽东在信中做自我解剖，用意在于告诫江青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江青当时已开始显露峥嵘了，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即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讲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6）。

张耀祠的看法综合了以上意见。他认为，毛泽东信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5）。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1）。金春明也认为，毛泽东本来应当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那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商谈

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的决策和设想，他却选择了向江青这个特殊人物倾吐心声，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方式，是因为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同他的老战友们有了隔阂。当然同时也包含着要江青去担负某些特殊使命之意〔4〕。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谈论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把自己的内心隐秘讲给江青听，表明毛泽东对江青是非常信任的，对于林彪则存有疑虑。而陈东林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并不是因为他把江青视为真正的知音，也不是如后人解释的那样，看出了林彪的反骨。他实在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12〕。

综上所述，搞清楚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是正确理解此信的动机和主旨的关键。学者们围绕信的动机和主旨发生争论，主要是因为对于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真实态度如何，在认识上存在分歧。

四．对信中若干论断的不同理解

（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对于毛泽东信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论断，最为重视的当属王年一。他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核心和要害〔1〕。“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1957年以后，在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认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的“左”倾主张（还没有定型，实际上是空想），因而愈来愈对总的说来实际上不同意他的“左”倾主张的中央第一线不满，甚至认为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搞掉中央第一线，也是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觉得惟有诉诸群众，惟有大乱一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王年一强调，如果对毛泽东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缺乏应有的注意，就说不清楚“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13〕。

在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被视为毛泽东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结论”。该书指出，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不能同它相比。只有下最大决心，花极大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因而，在毛泽东看来，“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在“大乱”中会造成种种损失，但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总之，在毛泽东心目中，“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经之路〔9〕。

金春明、席宣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打倒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的党和国家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不能采取通常的做法，也不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而只能直接依靠广大群众，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使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分子无所逃遁，方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所以他赞美乱，鼓吹乱，支持乱。如何评价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不少研究者对这一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导致“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的渊藪；但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本身没有问题，毛泽东向来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青年时代就注重研究历史，认为“治乱迭乘”乃“自然之例也”，乱“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同时，不怕乱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独特的性格和气质。许全兴从哲学的角度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历史上所谓乱，

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14）。张宇燕博士也肯定了“由大乱达到大治”的历史合理性，但其观点比较独特。他是受到美国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启发，从打碎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他举法国为例：法国今天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并且长期处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也恰恰是这个国家，几乎是连续不断地经历种种“动荡”：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接着便是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再就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随后是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哪一次也没少了法国，1968年全球性的学生运动法国也属于闹得最欢的国家之一。社会动荡频繁居然同经济成长健康并驾齐驱，何故？在动荡环境之中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发挥”其不良功能便是答案（15）。

有学者还分析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落空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敌我关系，本来是乱敌人，结果却乱了自己；二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利用，当他们的夺权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是决不会结束这个大乱的（16）。

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关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运动的思想。对此，学术界总体上持否定意见。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这纯粹是一种武断、臆断，是阶级斗争的循环论和宿命论，是一种历史的唯心论（17）。

胡为雄则认为，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是空穴来风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与“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是毛泽东总结建国后的政治经验而提炼出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世纪50年代的高岗和彭德怀“自己跳出来”，时间间隔约为七八年；而1959年至1966年，恰又间隔了七年，这次“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牛鬼蛇神”刘少奇等人又要“跳出来”了。毛泽东正是由此为发动“文革”找到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11）。张宇燕博士提出了一种另类的观点，他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视为“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贵重、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15）

（二）“虎气”与“猴气”

对于毛泽东信中“虎气”与“猴气”的自喻，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这一比喻充满了辩证法，反映了毛泽东多元化的个性：“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极为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18）许纪霖则从毛泽东文化性格的角度指出：“这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浑重、豪放，一股凛然的帝王之气。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19）陈晋赞同许纪霖的理解，同时又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退自如，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而虎气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刚健有为、努力进取的人格精神（20）。陈晋还联系毛泽东爱读《西游记》、钟爱美猴王孙悟空这一尽人皆知的事实，作出大胆推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

候，很有可能从孙悟空的性格中受到了某种启发。因此，不妨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20）。

金春明认为，要准确把握毛泽东自我解剖的真正涵义，必须结合“文革”发动之初的具体形势。他指出，虎气可以解释为“大无畏的造反者的勇气，敢于独树一帜的反潮流精神，藐视一切敌人的革命家胆略，机断专行的领导者魄力”；猴气则与上述精神相反（4）。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春明所理解的“虎气”内涵中的大部分内容，在陈晋那里都属于“猴气”的范畴。两人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分歧，原因在于陈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借题发挥的性质，是借用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来描述毛泽东的复杂个性；而金春明则充分注意到“虎气”与“猴气”在信中的语境，即毛泽东强调自己不是折中主义，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种语境决定了毛泽东的侧重点在于虎气。在“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强调虎气，可见虎气是指造反精神和大无畏气概。尽管孙悟空是猴，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却是虎气而非猴气。

胡为雄对虎气与猴气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认为应当把虎气理解为马列主义思想，把猴气理解为非马列主义思想，即遗存的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因素。对毛泽东所说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为雄作了独特的文化阐释，认为其深层涵义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文化环境中无法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虎，而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东方“猴子”通过学习马列，逐步锻炼成长为领导中共革命的“大王”。毛泽东说自己身上“虎气”为主，是指马列主义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猴气”为次，是指自己还有未曾尽脱的非马列主义思想，所以还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毛泽东此说意图在于表明他并非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更谈不上超过马克思，林彪的一些提法显然是过头了，使他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11）。

当然，更多的人还是认为毛泽东“虎气”与“猴气”的自喻是承接上文“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而来，虎气是指自信的一面，猴气是指不自信的一面。许全兴教授在遵从这一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细化为三层涵义：从直接的字面上看是为了表明自谦，说明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同时也告诫江青多想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深层涵义是为了剖析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坦露自己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更深一层的涵义则在于简洁含蓄地表达他对政治形势和接班人的看法：既对搞“文革”、打倒右派有信心，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不很自信，担心死后右派当权；既决心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又对自己的抉择不很自信，对林彪存有疑虑，以致准备将来被人打得粉碎（3）。

（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泽东信中颇费思量、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句话。这个鬼究竟指的是谁？金春明认为，这个鬼也就是信中讲的牛鬼蛇神、右派，是要打倒和横扫的对象。虽然当时还没有具体点明，但不久大家就都明白了，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与鬼相对的是朋友，在这界限分明的营垒中，林彪是自己方面的头号朋友。因此，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4）。金春明的理解也代表了多数人的看法，因此长时间内少有异议。

不过，也有人虽然同意金春明对打鬼的解释，但认为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许全兴具体分析了毛泽东那种难以言状的心理：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毛泽东认为，他在林彪眼里不过是个打鬼的工具。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

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3）？

还有人对“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中的“鬼”作了不同的解释。张聿温认为，这里的鬼是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毛泽东怀疑林彪是为了打倒“彭罗陆杨”，才借助他这个“钟馗”，林彪是在利用他（21）。

刘志男则推测这里的“鬼”是特指邓小平的。刘志男根据有关材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初，曾经考虑让邓小平配合林彪共同接班，并没有打算将邓小平和刘少奇一齐搞掉。但林彪和毛泽东的想法不一致，他认为邓小平是他接班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心要整倒邓小平。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在林彪、罗荣桓发生意见分歧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并且批转了“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提出批评。所以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除指责“彭、罗、陆、杨”之外，还点出“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这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东感觉到林彪别有所指，因此在此处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猜”字。虽然林彪并未点名攻击邓小平，毛泽东也只是在“猜”，但毛泽东却明显地怀疑“他们”与自己存在着“本意”上的不同：毛想倒刘保邓，他们却既要倒刘，也要倒邓。毛泽东怀疑他们是打着维护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幌子而另有所图，企图给邓小平加上“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从而彻底打倒邓，也就是说，是想把毛泽东当钟馗借以打倒他们想要打倒的“鬼”——邓小平。总之，毛泽东的一个“猜”字，道出了对林彪等人为了打“他们”的“鬼”的做法的疑惑（22）。

许全兴、张聿温和刘志男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毛泽东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不纯，有可能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对“打鬼”作了正面的解释，指出：“为了打鬼”，是指为了“横扫牛鬼蛇神”，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不使中国“改变颜色”（9）。据此推断，书作者显然是认为，毛泽东肯定林彪搞个人崇拜的本意、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打鬼”，只是觉得林彪搞个人崇拜搞得有些过头了，有些提法提得太高了，“简直吹得神乎其神”，令他“总感觉不安”。虽然毛泽东从心底里不同意林彪的那些“提法”，但为了“打鬼”，他不能公开给左派朋友们泼冷水，因此不惜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尽管他也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是“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毛泽东下了决心：为了“打鬼”，即使“跌得粉碎”也在所不惜。可见，在《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看来，毛泽东并不怀疑林彪搞个人崇拜的动机，他只是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一些过头提法有些不满意罢了。

（四）“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那么，他究竟是对林彪的哪些提法感觉不安？为什么感觉不安？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王年一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吹”，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1）。李君如认为，毛泽东既对林彪专讲“政变”经不甚满意，也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甚感不安（23）。

刘林元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月22日的中央“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有的同志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刘林元指

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6〕。

刘林元指出，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在信中提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月22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1966年9月22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6〕。

刘志男则认为，毛泽东的“不安”还包含着他自己本人没有明言的内容，即怀疑林彪的讲话话中有话，别有所指，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而且进一步指向他仍打算重用的邓小平。毛泽东担心批发“我的朋友们的讲话”可能会使邓小平处于被动的地位。但为了除去“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需要林彪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对林彪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但又说“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里的“重大问题”，在刘志男看来，不仅包括鼓吹个人崇拜，似乎还应当包括批判邓小平〔22〕。

当然，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不安”还是对林彪讲话中一些过誉之词的不安。刘林元的分析或许代表了多数研究者的看法。

对于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研究和解读，是学者们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研究时既要注意认真阅读原文，又要注意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抛开文本语境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脱离历史背景作牵强附会的理解，都是不足取的。到目前为止，围绕此信的研究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但真正有深度和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成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2〕胡哲峰，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 〔3〕许全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3）：85—90。
- 〔4〕金春明《一篇奇特的自我解剖》 党校论坛，1989，（5）：54—58。
- 〔5〕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 〔6〕刘林元《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 南京社会科学，1995，（11）：24—31。
- 〔7〕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教学参考：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下辑），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1980。
- 〔8〕张志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112—124。
- 〔9〕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03。

- (10) 辛鸣《过分清醒的现实主义》 毛泽东思想论坛, 1994, (2): 79—81。
- (11) 胡为雄《自我解剖的奇特还是自我信心的显溢》 党校论坛, 1989, (8): 45—49。
- (12) 陈东林《毛泽东诗史》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 (13) 王年一《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党史通讯, 1987, (4): 18—29。
- (14)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 (15) 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 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公共论丛, 1995, (1): 175—179。
- (16)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17)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上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 1980。
- (18) 陈登才《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 (19) 许纪霖《毛泽东: 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 书林, 1988, (9): 2—6。
- (20) 陈晋《毛泽东之魂》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 (21) 张聿温《“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 党史博览, 2004, (4): 4—8。
- (22) 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九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1, (6): 22—38。
- (23)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4年第4期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十)

· 舒 云 ·

#### 55、哪位外国记者第一个报道了林彪事件？

1971年9月17日20时30分,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向国内报告, 大使等人已于19时回到乌兰巴托, 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周恩来指示, 速派专人送有关材料回国, 当面汇报详细情况。9月18日凌晨1时, 大使馆报告, 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国, 并当面汇报。孙一先连夜整理出三个报告, 《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又赶写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 精心绘制现场测量示意图, 死难者尸体位置的放大图, 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现场位置图。还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 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等。

向国内发去四个报告后, 许文益大使请示, 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飞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外国使团中去, 有人问有无此事, 我馆如何回答? 几个小时后, 周恩来亲自批准的外交部复电发来了, 就说“国内正在查实, 暂时无可奉告”。

大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说, 我们初步估计, 由于双方存在分歧, 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 当然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 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收到周恩来嘱咐发的电报, 关于两个《纪要》问题, 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 等派人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保密工作。

9月14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干部回国休假，把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了二连浩特边防站的王站长。因为这是大事，王站长立即向内蒙古军区报告，最后报到北京军区和总部。周恩来得知，立即指示这个干部的所在单位将他隔离，并限令北京军区采取紧急措施，让得知这个消息的26人谁也不许扩散。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宣布，而是严格控制传达范围。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一级。中国强调是民航迷航，主要是严密封锁消息。只有保住密，才可能把引发战争的政治事件化解为一般的民航事故，迷航嘛，误入蒙古，这种情况合情合理。

因为中国“滴水不露”，使得国外只能是胡乱猜测，说什么的都有。

谜团越来越大，中国是怎么回事？“禁空”三天，不管军航民航，全部停飞。后来虽然飞机可以飞了，但仍然严格规定，所有的飞机不能进北京，南边的只能到徐州，北边的只能到沈阳，只有国际航班例外。

军队进入一等战备，休假者全被召回。一些外事活动也都取消了。原定9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停开，四届人大的准备中止。9月22日，外交部声明，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取消。国庆期间，尽管整个北京城像往常一样披上节日盛装，但借口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以及焰火晚会都被取消，而以游园代替。这在建国20多年的国庆中还是第一次。

中国太反常了，引起世界各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新华社记者杨达洲回忆：1971年9月14日，我在新华社东欧组上班。九一三事件这么大的事情，林彪座机是怎么掉下来的？林彪是不是还活着？这时还不知道。军代表到编辑部大小参考的参考新闻编辑部紧急动员，要求俄语室盯着塔斯社，组织收听广播。收听敌台，是总参三部和广播部门的事情，新华社没有这个业务。当时指定东欧组收听，特别是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很快知道民航飞机掉在蒙古，再后来知道是林彪座机。

蒙古也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一架民航飞机突然掉下来，也不知道里面有林彪，当时苏联也不知道林彪跑了。苏联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说，苏联当时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摔下来了？因为不久前，对林彪还是大加赞扬的。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正飞到苏联来。

这是政府的想法呢？还是个人的想法？

最敏感的是法新社驻北京的记者。他想起1971年8月，毛泽东接见外宾，林彪在场。但《人民日报》却分别发表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外宾的照片，好像分别接见似的。他感到北京紧张、神秘，于是老在新华社门口、外交部、钓鱼台、中南海的外面转，发现新华社门口墙皮上白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给涂掉了，马上猜测林彪出了事。9月15日他第一个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危机，危机的挑起人可能是林彪。这才引起苏蒙方面的重视。

日本政府部门根据法新社消息称，这架飞机是被击落的，机内有被黜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

奇，他企图逃往国外未遂丧命。英国《卫报》10月1日刊登记者莱斯卡萨9月30日从香港发出的消息，说不管所传在蒙古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的意义如何，这里的分析家却认为，从9月中旬以后，中国领导人中发生了重大问题，人们普遍排除了早些时候关于毛泽东患病或去世的推测，而赞成环绕副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其它委员的地位问题的一些说法。林彪一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从6月以后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不管是因为生病或是国内的政治原因，林彪权威的削弱，都有必要使中国最高领导人重新排队。军事领导人最近几周引人注目地没有露面，这使许多分析家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特别卷入了当前这场危机；另一方面，周恩来继续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并且看来已完全控制了局势，他可能比以前更为有力。

因为摸不到真正的“底”，蒙方从失事现场回来后，一连几天没有动静。

9月22日15时30分，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奉政府之命，要求中国政府在9月25日前就失事飞机越境侵入蒙古领空一事，做出正式解释。蒙方态度强硬，重新使用了“侵入”二字。许文益说，9月14日已经奉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二司司长说，那不够，要求你们9月25日前用书面形式给以正式解释，根本不提继续会谈的事情。

#### 56、蒙古为什么公布256三叉戟失事的消息？

1971年9月29日15时30分，蒙方再次以要事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对中国政府未就飞机失事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表示遗憾。并称此事已在蒙古人民中间引起各种传说和议论，所以蒙古决定发表一条简短消息，以说明事实真相。

许文益说：对蒙古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及时作了两次说明，希望在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不要做出与此相违背的事情。

蒙方强调不是发表政府声明，只是发表一条一般的消息。

两个小时后，蒙古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0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30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找到烧得残缺不全的9人尸体、枪支、文件和物品，证明这架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的飞机。已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代表们到现场观看了失事飞机。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一事，蒙古方面向中国方面表示了抗议，并要求做出正式解释。

9月30日，蒙古各报纸和外语广播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蒙古《真理报》将这条消息登在四版很不显著的位置。

王中远回忆：蒙方9月29日下午突然公布消息，我们也很注意，录音翻译出来汇报国内。中国飞机侵入蒙古上空，还是这口气。

许文益分析，虽然蒙古在我国国庆前发表这条消息，对正在改善的两国关系有不良影响。但从各方面分析，蒙古当局似乎无意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蒙方在我国国庆前专门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的电影酒会，还为中国大使安排了几场主要拜会，蒙方出席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的领导人比上一年多，规格也高。

看来，蒙古还是想继续与中国改善关系。

根据国内指示，许文益对出席我招待会的外交部副部长云登表示，对蒙方发表的失事消息，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表示遗憾。云登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一事件告诉群众，只发表了一个一般消息。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到一定时候会给予答复。

王中远回忆：9月17日我们回到乌兰巴托，马上转入迎接国庆。这对使馆来说是很大的活动。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处长平时对我们很友好，问我林彪还活着吗？当时我并不知道，包括外电都传出来，我们忙着根本顾不上，十一后传达才知道。国内指示，如果问起来，一切照旧。他点点头，很会意地走了，看来他想从我这证实一下。

这说明蒙方已经从国际传闻和揣测中，猜到死者中有林彪。

国庆节前后，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逐级下达，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奉命停止向蒙方交涉。以后蒙方也没有再提及失事飞机。

2 5 6 三叉戟如何失事，仍然是一个谜。

5 7、飞机失事应该怎样现场调查？

因为中国没有派事故调查组到坠机现场，使这个“一等事故”更加扑朔迷离。

按照“一等”的规则，应该立即封锁现场，在最快的时间内组成由机务、飞行、领航、调度以及空军机关的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奔赴现场。

在事故调查中，要从方方面面去获取信息，调查要包括与实施飞行有关的全体人员，飞行员、飞行指挥员、管制人员、机务人员、雷达、通信、导航、油料、航材、警卫等。飞行的全过程中飞机与机上人员所处的各种条件，所遭遇的各种问题，包括飞行活动区域的天气情况，起飞和降落以及备降机场的状况，飞机空域、航路、航线的状况，雷达、通信、导航的情况，机场起飞前的准备，检查、加注燃油、氧气等情况。前一次飞行飞行员对飞机状况的反应，起飞前的检查情况，飞行员飞行座舱、身体情况、技术理论水平、思想状况、技术，以及机组配合等。逃生的飞行机组成员及旅客，飞行数据记录器，航空器制造厂家，目击者和空中交通管制人员，都要调查到。

除了要求专业人员对现场录像、拍照和测量，还要化验尸体血样，看是否饮酒或服药，以及饮服的剂量。此外，还要搜集飞机残油包括燃油滑油液压油等，以此判明油料质量及机件是否有磨损等。

飞行事故的概率极小，平均十万次飞行也可能碰不到一次。但一旦发生，就非常严重。从理论上讲，飞行事故的发生有着严格的内在规律性，事故的“随机”和“偶然”只不过是“确定”或“必然”的外在形式。

事故现场是最重要的“资料库”。但它散在露天，由于撞击的高温，许多残骸面目全非，加上风沙、雨水、人为等因素，会很快消失或变态。越早，真实性就越强，失去了及时性，也就失去了可靠性。事故现场残骸的分布和原始位置等，对判明飞机失事时的状态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及及时加以准确地标定和搜集，被移动，丢失或再次损坏，就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尽管空难突然，但调查必须迅速展开。

还要尽快对事故当事人和见证人进行调查。同样，距事故发生的时间越短，取证的材料准确性、真实性就越强。人的思维有用想象或用以往的经验来填补观察的特点，同时又有按大多数人的说法来描述自己观察的特点。如果时间拖长，取证的材料可能更合理全面，但关键问题可能失真。而且目击者受专业知识等方面的限制，只能提供一些现象。

我国对飞行事故的分类统计大致四类，按飞行事故关联的密切程度，分为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调查飞行事故要做大量的工作，各部门、各方面的专家合力，要研究各零件的不同特点，涉及到设计、制造、维修、使用各个环节。因此事故调查组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搜集信息要全，飞机残骸，飞行数据记录仪、舱音记录仪、视频记录仪等，都能提供事故信息。没有这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勉强做出事故结论，必然缺乏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就很可能是谁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

搜集信息是繁重细致的工作。一架运输机，仅零部件就有几百万个，近百人参与，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空难。1988年12月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英国苏格兰城镇洛克比坠毁。事故调查人员走访了13个国家，行程150万英里，访问1.4万人，拍摄了73.5万张照片，电脑分析了数千人搜集的1.6万件残骸遗物，才找到空中爆炸的确凿证据，包括能证明定时炸弹爆炸的性质、种类、生产国及该爆炸物使用量的证物，搞清了定时炸弹放在某型录音机里，某型录音机放在飞机前部货舱的某国购买的某型号衣箱中，为事故结论提供了可靠依据。

现场调查后，还要在实验室对每一个破坏件进行研究，对操纵管理材料设计等都要进行综合分析和故障模拟。航空安全就像一块织物，一根线，甚至两根三根线断了，都不会有事，但越来越多的线断了以后，危险就增加了。绝大多数飞行事故不止一个原因。不能孤立夸大某一个事实，而不顾及其它。技术、机械、飞行员生理和心理、组织指挥、勤务保障、规章制度、工作决策、部门协调、人际关系等等缠在一起，其直接原因千差万别，更何况严重的后果带来的行政责任、经济损失、感情纠葛，也会使客观的认识带来主观的影响。

这就使绝大多数飞行事故不止一个原因，前一个的结果导致后一个的起因，形成长长的“事故链”。调查飞行事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各种事实进行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判断。一切结论产生于深入调查之后，不能预先定框架。不到最后，你很难确定谁是“肇事件”，有的大空难拖了十年才搞清楚。在特定条件下，允许一时做不出事故结论，不要勉强，更不能牵强附会，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始调查。

256三叉戟摔在蒙古境内，这给现场调查带来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1993年4月6日，东方航空公司MD-11客运班机从上海飞往洛杉矶，在太平洋上空发生强烈震荡，紧急迫降在美国阿留申群岛西米亚空军基地。我国民航委托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1994年4月26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A300客机从台北飞往日本名古屋，降落时坠毁。有关部门迅速前往调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也很快派专家调查。

作为坠机事故调查，最重要的是保护现场，不能破坏，不能移动。可256三叉戟坠毁在国外，牵扯到两国甚至三国的关系。又因为256三叉戟是在凌晨坠毁，等蒙古官方去时天已经大亮，而且是老百姓救火之后。

蒙古人移动了尸体和遗物，苏联人又大拆大卸。

现场的破坏是绝对无疑的了。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赴现场的人员都是外行，他们只是拍了一些照片，没有去注意飞机上尚存的仪表、油料等，也没有走访目击者，甚至连坠机的准确时间都不知道。

飞机坠毁的时间是蒙方确定的，因为蒙方收走了机上所有人的手表。

59、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为什么中途下车？

李文普“创造”了“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谜，还“创造”了另外几个谜。

虽然林豆豆反复做李文普的工作，但李文普的意思是到紧急关头把“大红旗”锁在车库，说他已经做好林彪司机杨振刚的工作。实在不行，就在飞机上搏斗。林豆豆不同意，上了飞机，一切都将无可挽回。但李文普认为没办法不上车，首长要走，他一个警卫秘书怎么敢拦？

这话没错，那你李文普跟着走就是了，可为什么半路上你突然下车，不跟着走了呢？你是林彪的贴身警卫，历来是林彪到哪儿你跟到哪儿。是什么事情让你吃了豹子胆，居然敢不跟着“首长”走呢？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使一直不相信林豆豆话的李文普独自一人下车，而且还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是不是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拦阻后，坐在“大红旗”副座的你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呢？你坐在司机杨振刚旁边，看得很清楚，8341部队的战士打着背包坐在路边，大队长姜作寿拦车，差点儿被撞。这一切使一直不相信林豆豆话的你不仅突然“开窍”，而且还来了一番“苦肉计”。

在被中央专案组关押时，问到为什么跳车？李文普说，原来准备去广州，可在车上发现肯定不是到广州，这里面有鬼。总之李文普认为这回走不正常。

1980年，为审理“两案”，总政取证组到山西吕梁的矿山，找到李文普。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一样，在“亚疗”的审查结束后，到团河农场劳动，之后分配到部队，以后他申请转业，到山西吕梁的矿区。

总政取证组成员李唤劳回忆：事隔将近十年，李文普与原来说的基本一样。他说事先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跑，路过8341部队二大队门口，大队长姜作寿一拦车，“大红旗”车里边人慌了。李文普刚开始把林豆豆的话当成儿戏，因为叶群吹过风，说林豆豆有精神病。但李文普一看8341部队拦车的紧张阵势，马上感觉到不对。大队长姜作寿为什么拦车？还有人大喊停车。林豆豆向8341部队报告了，8341部队肯定向中央报告了，如果上边没有指示，8341部队怎么敢拦林彪的车？李文普上车前想与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联系，接通了，却被林立果掐断了电话，李文普没搞清上边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从大队长姜作寿拦车看，上边一定是给了“不让去机场”的指示。李文普脑子里一团乱麻，林豆豆已经和他讲了那么多，首长还是被骗上了车，如果出了事，他跑不掉。为什么叶群不让停车？应该停车，问问清楚。再说，这么慌乱，林办的人也不全，不该这么走。李文普对总政取证组说：“当时我就是想下车问问怎么回事。我是警卫参谋，有什么事处理，执行任务，不停，还打我一枪。”

原来，李文普跳车的思想如此简单。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新浪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http://www.cnd.org/)

---